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理论中,将中国这一古老国家与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的接触,视为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古老秩序进行的挑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因此,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就是西方对中国社会不断“冲击”以及中国社会的“回应”。^①就图书馆的发展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势力,“回应”的首要途径是救亡图存,做“新民”成为“中国第一急务”,社会教育被视作“民族复兴”的良药。清末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的萌芽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知识精英自下而上的推动,带动了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把控,图书馆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承担起教育国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然而,保罗·柯文等学者针对西方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冲击,提出从中国内部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内部形态及发展动力进行研究,提出“中国中心说”。^②这些学术观点引发我们对图书馆发展模式的思考,图书馆在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多维视角。在早期接受西方图书馆学思想时,经历了“冲击—回应”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也经受了来自“中国中心说”的考验,梁启超试图打破费正清的“回应”模式,提出“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北京的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中国

^① 顾钧:《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5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② 闵韬:《保罗·柯文等美国学者关于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争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传统与西化思想的碰撞较为典型,但学术界过去对此研究相对薄弱,还未见北京的图书馆史研究专著出现。因此,有必要将北京的图书馆放在民国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在整个民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全面系统地展示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状况,深化图书馆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提高全民素质、提高全球竞争力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大力提倡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今天,社会教育作为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补充,在国内外都受到了极大重视。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载体,是全天候的导师,它不受时间、空间、职业、年龄的限制,是人民的大学。寻找一条新世纪切实可行的图书馆转型创新发展路径,是国家和社会期待今日图书馆取得突破的课题。文化建设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民国时期站在中国图书馆发展潮头的北京图书馆发展经验,可以为今日图书馆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的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战略需求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有鉴于此,2015年笔者以“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为题,申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以该项目为依托,最终完成了本书。本书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全面展示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寻其成败因素,对今日图书馆发展提供借鉴,本书选题的意义也在于此。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1. 范围界定

本书以“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为研究主题,以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图书馆发展顶峰时期的132所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分为五种类型:①国立图书馆;②市立图书馆;③学校图书馆;④私立图书馆;⑤会社图书馆。研究各种类型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关注北京的图书馆馆舍、藏书、管理、学会、学者等问题。

2. 区域界定

民国时期,北京的名称曾数次更改。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一直称为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迁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日伪时期北平又改为北京,但国民政府不承认改名,仍称其为北平;抗战复员后复称北平。为行文方便,本书一般称为北京,在具体描述当时环境时,则使用当时的称谓。北京的城市管辖区域包括城区和郊区。民国时期的四郊分别是:东至东霸,与通州界;南至羊房,与宛平界;西至香山,与宛平界;北至清河,与昌平界。

3. 时间界定

本书研究时段为1912—1949年,具体时段与政治史分期一致。图书馆发轫于清末,本书将清末的藏书楼、阅书报处作为背景纳入研究范围。具体到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共分为四个时期:1912—1928年为初创时期,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为起点,至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1928—1937年为发展时期,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起点,至“七七”事变爆发前为止。1937—1945年为萧条时期,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为起点,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1945—1949年为恢复时期,以日本投降为起点,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北京成为变法图强的中心,“五四”运动中更是北京率先扛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文化的传播与发达,使北京在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从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的巨大变革中,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心。

北京的中心地位,使清末新兴的图书馆活动很多从北京开始,北京的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图书馆史的著作中,对北

京的图书馆多有涉猎,如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①,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北京的公共图书馆发展情况,以及有影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高师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等。

区域图书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学术视野的转换和深化。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区域馆史的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河南省图书馆百年》^②《湖南近代图书馆史》^③等,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在区域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北京的区域图书馆史综合研究,目前还没有专著问世。《北京志》中的《图书馆志》部分,^④收录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的简介信息。张树华主编的《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⑤也有关于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图书情报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图书馆、工厂图书馆、中学图书馆等的介绍,主要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情况。

关于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研究论文,有张树华的“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⑥该论文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分六期刊出,分为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辛亥革命以后北京地区的图书馆事业、“五四”运动与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的图书馆事业,以案例群的方式对北京的图书馆进行了梳理。张树华另在“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私立图书馆述略”^⑦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在蔡元培、鲁迅的推动和教育部图书馆规程的鼓励下,北京地区由公共团体和私人设立的图书馆数量很多。该文介绍了北京私人成立的图书馆、宗教团体创立的图书馆、其他社会团体主办的图书馆。

近年来,北京的一些图书馆出版了本馆专题馆史研究著作,如李致忠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金沛霖的《首都图书馆馆史》,吴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韦庆媛、邓景康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等;还有研究

① 谢灼华:《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1~39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王爱功、张松道:《河南省图书馆百年》,1~236页,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③ 沈小丁:《湖南近代图书馆史》,1~32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

④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图书馆志·文化艺术管理志》,2001年,171~373页。

⑤ 张树华:《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1~76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⑥ 张树华:《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年第1~6期。

⑦ 张树华:《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私立图书馆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108~111页。

各馆历史的单篇论文,如翟志宏的“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朱强、王波等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①韦庆媛的“清华学校在中国图书馆近代化初期的历史作用”,陈雁的“民国时期北京中法大学图书馆建设研究”。这些图书和论文立足于本馆个案,对史料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应用,重在梳理馆史,总结经验,弘扬传统,写出了有深度的专题史。

在专题论文研究方面,1920 年在北京高师举办的图书馆学讲习会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员短期专业培训活动,翟桂荣从当年《晨报》所刊发的十余次全程报道入手,论述培训活动的缘起、经过、历史意义及影响。^② 郭平关注北京与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关系,从北京的图书馆教育、北京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北京的图书馆学专业书刊等方面,分析了北京在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影响和作用。^③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学专业组织,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研究论文较多,论文主要从研究年会^④、会报^⑤等多方面展开,李彭元则全面总结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贡献,他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基本解决了民国时期阻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学术问题,参与培养了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人才方阵,奠定了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⑥

北京的学者群体在图书馆发展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学术界关注较多的参与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名人有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鲁迅等。梁启超因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学界有特殊的地位。王子舟带领研究生讨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仍在路上。^⑦ 对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有研究,陈光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总

① 朱强、王波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 年第 6 期,5~16 页。

② 翟桂荣:《1920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的历史意义及影响》,《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 年第 4 期,121~126 页。

③ 郭平:《北京与近代“新图书馆运动”》,《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 年第 6 期,45~50 页。

④ 梁桂英:《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 9 期,80~84 页。

⑤ 邓咏秋:《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 年第 2 期,119~121,108 页。

⑥ 李彭元:《试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历史贡献》,《图书馆论坛》,2018 年第 2 期,1~11 页。

⑦ 王子舟等:《“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仍在路上——纪念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发表 90 周年》,《图书馆论坛》,2015 年第 5 期,6~12,67 页。

结了梁启超的目录学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观点,内容详实丰富。^① 蔡元培因最早倡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将图书馆纳入社会教育范畴,而受到研究者关注。全根先认为,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对于我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门图书馆的建设均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专业学者领导图书馆走上了专业化道路,韦庆媛研究了戴志骞的“两半球论”“六要素说”等图书馆学思想,^③张红扬阐述了袁同礼如何带领北京大学图书馆顺利度过内忧外患的年代。^④

在海外,也有一些关于北京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唐金红(Jinhong Tang)在获得西悉尼大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教育改革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以1909—1937年的京师图书馆为例》中,^⑤阐述了京师图书馆的形成及早期发展。以往研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迁美转台主要依据中文资料,玛格丽特·方(Margaret C. Fung)在“1941—196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的保管”一文中,^⑥利用外文资料,从保存的角度展示了这批资料的特殊经历。

关于北京图书馆人物的研究,在海外也有一些成果。国外对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的研究远早于国内,最早提出“知识组织”概念的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亨利·埃韦林·布利斯(Henry Evelyn Bliss)在其1933年出版的名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中,依据戴志骞提出的“静态”和“动态”两种专业图书馆类型,定位商业图书馆为“动态”图书馆。^⑦ 台湾学者涂光霁在博士论文“西方知识和价值的转换与传播:20世纪早期中国图书馆服务的形成”中,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档案资料,查找到北

① 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3年第4期,156~171页。

② 全根先:《蔡元培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山东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3期,18~22页。

③ 韦庆媛:《戴志骞新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图书馆》,2010年第6期,58~61页。

④ 张红扬:《袁同礼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年第5期,118~121页。

⑤ J.H. Tang, Educational Rreform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of Beijing, 1909—193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2004.

⑥ Margaret C. Fung. Safekeeping of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s Rare Chinese Book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1—1965.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84, Vol. 19, No. 3, pp.359-372.

⑦ Henry Evelyn Bliss.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Libraries and the Subject Approach to Books, The H. W. Wilson Company, 1933:108.

京留学学者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一些必要的史实。^①

上述研究现状表明,学术界已经从不同侧面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看,总括性研究较为简略,专题性研究缺乏整体概念,一线人物研究多,二线人物研究少,无法从宏观上全面了解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全景,这与其在中国图书馆历史上的地位不相符合。从实现突破的研究取向上,本书选择从整体上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把北京的图书馆放在民国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整个民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分阶段、按类型研究北京图书馆的发生和发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之处及资料来源

1. 研究内容

本书分十个方面,主旨在于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的全面考察,厘清在整个民国时期北京各类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总结其成效和制约因素,通过反思,对今日图书馆的发展提出启示。具体内容包括十章:

(1) 概述

民国时期是从封建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概述部分以问题意识为先导,明确课题的范围、区域、时间等概念,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阐述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之处及资料来源,说明核心观点及主要建树。

(2) 清末北京的图书馆萌芽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民国以前,早期教会图书馆、开放的共读楼、维新时期的学会和学堂藏书楼、新政时期的图书馆、清末的阅报处已经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章着重阐述这些活

^① Kuang-Pei Tu.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haping of Library Servic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动改良了社会风气,直接推动学部加快制订建设全国图书馆的规划。

(3)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阶段

民国政府建立后,正式确立了图书馆制度。图书馆积极发挥社会教育职能,“保存国粹”和“服务民众”双轨并行,同步发展。北京的图书馆经历了初创时期(1911—1928)、发展时期(1928—1937)、萧条时期(1937—1945)、恢复时期(1945—1949)的不同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国立、市立、学校、私立、会社等多种类型图书馆。本章厘清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脉络,明确各类图书馆的功能和线索。

(4)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建筑扩充与馆藏建设

中国在向西方图书馆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器物不足。馆舍数量不足,地点偏远,条件不合,影响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民国时期开始建设新式馆舍,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馆舍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藏书建设,官府、私家、书院藏书逐渐汇聚到近代图书馆中来,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表现出古籍收藏量大、藏书发展不均衡、抗战时期图书损毁严重、战后恢复迅速的特点。

(5)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业务管理与流通服务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类型多样,虽有国立、市立、学校、私立、会社图书馆之分,其功能不同,藏书结构亦有所不同,但其业务管理工作是一致的。各馆在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分类编目、提供服务等基础业务工作方面多有交流。各类图书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同处一个共同体内,在业务上互相促进,互为补充。本章主要揭示各类型图书馆业务管理工作与流通服务的情况。

(6)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专业教育与学术活动

北京是最早开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地区。北京的图书馆通过开办图书馆学讲习会、图书馆学培训班、建立图书馆学系,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北京最早开展图书馆学术活动,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由北京学者领衔,中华图书馆协会总事务所设在北京。北京的图书馆专业组织通过举办常会、学术年会等开展学术活动,传播学术信息,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7)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构成及特点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包括社会知识精英、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在北京工作的外国馆员、传统文献学者,他们以群体的身份出现在北京的

文化舞台上,投身到倡导新学、启发民智、培育人才、开新风气的社会大潮之中,引进新观念,开展新服务,在图书馆建设、管理、教育、研究、与世界图书馆学界交流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引领者。本章主要分析学者群体的构成和特点。

(8)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成效与制约因素

本章主要阐释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对北京乃至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分析北京的图书馆在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奠定近代北京图书馆的基本格局、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工作秩序、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建立学术团体、提倡开放服务以及推进北京地区现代化进程等方面的成绩。同时注意到,北京的图书馆发展也受到了政治不稳、经费不足及来自人们旧观念的阻碍。

(9) 对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发展历程的反思

本章全面反思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总体情况。肯定图书馆在“保存国粹,造就通才”的思想指导下,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果极为显著。同时也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脱节,图书馆对民众教育收效未达预期;未能充分发挥乡绅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作用,城郊乡村地区图书馆处于空白;在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问题上,“传统的”与“西方的”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10) 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发展历程的启示

本章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对今日工作的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图书馆应贯彻为民众服务的宗旨,提高图书馆开放程度;将民众的喜好纳入考量体系,设计民众喜闻乐见的图书馆教育活动;重视基层图书馆建设,构建合理的图书馆网;加强理论研讨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鼓励创新,促进发展。

2. 研究方法

(1) 在理论方面,运用大历史观等方法进行研究。本书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用历史的长焦距审视北京的图书馆演变,进行基本史实的考证与建构。同时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教育、思想变迁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规律。

(2) 在应用方面,采用文献调研法,重视查找原始资料,对图书馆发展历程进行考察研究。同时运用统计分析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直观生动地反映图书馆发展规模与程度,发现发展的线索与轨迹。

3. 创新之处

(1) 选题视角创新。本书突破原有的介绍性、个案式研究方式,整体展示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本书把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的四个时期、五种类型融为一体,为北京的图书馆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2) 研究方法创新。本书作为区域图书馆史研究,突破以往碎片化的研究方式,运用大历史观理论,把图书馆的发展放在民国历史的长时段中考察。在应用方面,注意使用统计方法,运用大量图表分析,用数据说话,得出可信的结论。

(3) 应用资料创新。本书突破以往主要使用中文资料进行研究的局限,从整体上、不同角度搜集多种类型资料,尤其注意应用外文资料进行研究,扩大视野,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和严谨性。

4. 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变迁的过程,进而总结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成效与制约因素,找出发展规律。对此研究应注重客观再现历史真实,并辩证地进行分析评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大量资料,这是研究的基础。

(1) 档案史料。

北京市档案馆民国档案是北京历史的直接记录,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存有部分有关北京的档案,这是本研究最直接的资料。

(2) 民国书刊。

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都进行过图书馆调查,其出版的调查报告很有价值,其中有关于北京的各种类型图书馆情况。北京各类图书馆出版的各种形式的概况、一览,也是了解该馆的重要资料。

报刊以其短小精悍的特点记录当时史实,也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出版了《中华图书馆协

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北京图书馆协会也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八种期刊，数量最多。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出版有馆刊，北京各大学、机构也有馆刊出版。抗战时期日本人办的“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也出版了刊物，这些期刊方便我们查找北京的图书馆动向、了解馆员和学者名单、查找馆员著述等。

除图书馆专业期刊外，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报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图书馆方面的资料，如《新教育》刊登了历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的会议、提案等情况。其他社会教育的报刊也有一些图书馆的资料。各学校出版的校刊一般都有本校图书馆的信息，是反映当时情况不可多得的材料。

（3）法令汇编、统计数据。

民国时期北京出版了一些法令、年鉴、政府公报、各种统计等，其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可以作为图书馆档案材料的补充或修正数据。教育部编辑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8年）提供了一些教育信息和统计数据。北平市政府编的《北平市教育法规汇编》（北平社会局教育科，1933年）、《北平市市政公报》（1928年创办），其中有政策法规、人事任免等事项。此外，民国时期的京师学务局、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等公文、总结报告、统计数据等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

（4）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已经出版的张树华主编《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图书馆志、文化艺术管理志》，是直接的参考资料。间接的如耿申等编的《北京近代教育纪事》，也收集了北京地区的相关教育信息，其中亦有图书馆的信息。期刊文章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不断有关于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等个案专题研究文章出现，也是有价值的专题参考资料。

（5）外文资料。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留学海外，带动了开眼看世界的人们走向国门。留学学者的第一手外文资料是了解学者经历、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参考。美国学校留下了他们学习的记录。如美国纽约州大学院图书馆学院学

生名录^①、纽约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等,^②都是重要资料。

1926年5月,在孟禄(美国)、杜威(美国)与郭秉文、胡适等中美著名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在美国纽约创建了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该社分别于1927年、1928年、1931年、1936年出版了四册《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学位论文》(*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43—1945年华美协进社又连续编辑出版了《旅美中国同人录》(*Directory of Chinese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Students in America*),该书收录当时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馆员信息。

1933年、1943年、1955年、1966年、1970年美国分别出版了五版《图书馆服务名录:美国和加拿大图书馆员传记录》(*Who's Who in Library Service: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Libra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其中收录了华裔馆员的信息。

一些专题性的外文论文往往会有国内从未见过的资料,一些综合性的论文可从不同角度了解外界对于中国图书馆的看法和感受,如“历史回顾:中国的图书馆服务”等^③。

综上所述,关于北京图书馆主题的资料相当丰富。本书在查阅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参阅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描绘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初创、发展、萧条、恢复的曲折历史,做出历史评价。

第五节 核心观点及主要贡献

1. 核心观点

(1) 北京的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软实力

由于北京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图书馆的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半部

^① James I.Wyer.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Register 1887—1926.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Association,INC.,1959.

^②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Library School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nnual Report. New York: The Library School,1918.

^③ Lee-hsia Hsu Ting.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Historical Overview.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83, Vol.53, No.2: pp.134-160.

全国图书馆的发展史。本书关注“人”的作用,通过系统总结社会知识精英、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在北京的图书馆工作的外国学者、传统文献学者等群体的构成和贡献,寻找图书馆发展的软实力,为图书馆文化史研究提供新视角。

(2) 北京的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率先奠定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格局,建立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秩序,最早开展专业教育,建立学术团体,在为普通民众和学术研究服务的“双轨制”图书馆体系中,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为民众提供知识储备,推进了北京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3) 北京区域馆史进程体现出国家意志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从自下而上的知识精英启蒙,到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把控的过程。国家政权通过制度规定,将图书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作为区域馆史研究,本书揭示在现代化语境下,国家政治取向、国家制度变化对北京图书馆发展的影响,重视政学之间的互动。

(4) 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特征具有普适性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在促进近现代学术体制的转型方面成果显著,但在民众教育方面收效未达预期;城郊乡村图书馆处于空白,未能充分发挥乡绅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作用;未能建立“传统的”与“西方的”沟通渠道,从而真正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对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发展史的反思具有普适性,启示今日图书馆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 主要贡献

(1) 挖掘北京图书馆发展的软实力,拓展图书馆文化史研究新视角

本书利用民国时期的档案、非公开出版物、期刊论文、各种专著、外文文献等资料,考证翔实,挖掘以往未见的史料,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数据及图片,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的人物和事件。“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本书关注“人”的作用,用较大力度挖掘北京的图书馆人物史料,系统总结社会知识精英学者、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在北京的图书馆工作的外国学者、传统文献学者的构成和贡献,注重寻找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的软实力,为图书馆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 揭示北京在民国时期图书馆转型中的示范作用

本书通过具体史实的构建,揭示了北京的图书馆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奠定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格局;建立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秩序;最早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培养了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最早建立学术团体,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北京的“双轨制”图书馆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在引导民众走向“新民”,“使人民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主旋律中扮演重要角色,推进了北京地区现代化进程。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重镇。

(3) 强调用大历史观研究区域馆史

北京近代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自下而上的知识精英启蒙,进而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实现把控,将图书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往对区域图书馆史的研究多将区域历史作为关注的焦点,局限于一地一馆的发展,国家政权成为虚化的符号。本书作为区域馆史研究,运用大历史观研究方法,将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置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密切关注在现代化语境下,国家政治取向、国家制度变化对北京图书馆发展的影响,把图书馆的发展与国家培养现代国民的导向结合起来,重视政学两界的互动。

(4) 立足区域馆史研究,反思整个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进程

本书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认识到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在促进近现代学术体制的转型方面成果显著;通俗图书馆在民众教育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民众教育收效未达预期;城郊乡村图书馆处于空白,未能充分发挥乡绅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作用;关注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问题,但没有建立良好的“传统的”与“西方的”沟通渠道。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图书馆和其他区域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普适性价值,其中反映出的经验教训对于指导当今图书馆的发展仍然有现实意义。